

绿

岛

绿岛傻想

一个哲学博士的特区情结

CONTEMPLATIONS
ON
HAINAN ISLAND

ZHOU WENZHANG

周文彰 著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海南出版社

傻

想

一个哲学博士的特区情结

——《绿岛傻想》修订版序言

廖 逊*

1993年,文彰同志的《绿岛傻想》初版时,我为它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是这样的:

近些年来,到处都在流行一句时髦话,叫做“想得太多,活得太累”。本来嘛,生存竞争那么激烈,脱贫致富那么费心,还要追求文化享受,谁还有精力再去思考形而上的哲理,研究令人费解的国家大事、人类前途?千百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六亿神州”不必“尽舜尧”。专注于生产力发展的民族,更没有必要去拼凑“亿万批判家”。“想得太多,活得太累”,道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可是,世界上偏偏就有像周文彰那么傻的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把自己有限的年华,倾注在无穷无尽的忧思、探索和创作上。他非但不认为自己“想得太多,活得太累”,反觉其乐无穷。所谓“好学深思的人”,所谓“学者”,所谓“知识分子”,大约就是这么一种怪物!

* 廖逊,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古希腊哲人有个刻毒的比喻,把“想得其乐无穷”的人和抱怨“想得太多”的人,称为“痛苦的哲学家和快乐的猪”。

在这个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年代,人人都应学会宽容,学会和平共处。即使是“痛苦的哲学家”和“快乐的猪”之间,也不应例外。或许正是因为“哲学家们”的不宽容、不平和,总是逼得“快乐的猪”,不得不戴上“哲学家”的面具。假如我们周围那些被誉为“学者型官员”、“学者型商人”、“学者型企业家”的朋友,都能像周文彰那样独立思考,那样无愧于“好学深思的人”、“学者”和“知识分子”,那么我们的精神生活,至少会比现在瑰丽绚烂得多。

周文彰博士来到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组建和领导社会文化处。就其功能而言,社会文化处对知识结构的要求,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而在社会转型的年代,每一学科的知识都在全面更新,衡量一个研究人员是否合格,往往不在于他是否掌握了教科书里的知识,而是在于他是否批判教科书里的知识。

在社会转型年代,我们往往看到这种现象,一个经济学者脱口而出的,会是哲学界听来陈腐不堪的哲学观念;而一个哲学学者脱口而出的,也会是经济学界听来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念;社会学刚刚复兴十几年,大多数人只是通过大众传媒,略知皮毛;而文化人类学更是曲高和寡,难觅知音。再细分下去的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之类,更难与兄弟学科接头。对此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搞一大堆各执一端的专才,要么以一个通才挂帅,再配几个重点学科的专才。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后者。一个哲学头脑发育健全的高层次通才,往往要胜过一打知识结构陈旧、观点七分错误三分无用的庸才,这就是最优产出效益之所在。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哲学博士来“组阁”。社会文化的研究对象,包括了广大非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于是我们为周文彰找到了一个忧思面最宽、“人不堪其忧,彰也不改其乐”的领导岗位。

周博士也果然身手不凡,从来不“等、靠、要”,无日不思,无日不写,锋芒所向,直指阻碍大特区建设的各种观念文化。他以其敏锐的目光,透过枝节横生的重重迷雾,主动发现问题,主动组织课题,在海南的大小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由于某些杂文的尖锐泼辣,研究中心一些好惹事的朋友,给他取了个“周鲁迅”或“谄鲁迅”的雅号。在本书收入的30多篇论文中,除了《海南可以跑马》之外,几乎没有一个题目是中心领导的“命题作文”。

今天,海南各级领导言必称“特区意识”,言必称“国际惯例”,年年组织“海南国际椰子节”,都与周文彰同志的辛勤耕耘、大胆创新分不开。外地同志来海南要看的《海南省情概要》,是周文彰主持编写的。人们将要阅读到的《国际惯例书库》也是周文彰主持编辑出版的。他绝不是那种划地为牢、人莫予独的人。作为一个以观念创新为乐的学者,他总是孜孜不倦,求新求异。一旦其创新为社会所共识,引来喧闹的大合唱,他就翩然淡出,再去寻找和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潇洒飘逸,卓尔不群。周文彰,奇人也!

我喜欢说,海南大特区,是一个小人物干大事业的天堂。博士虽然不简单,像周文彰那样成为全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者,就不是很多。而像周文彰那样,一戴上“方帽子”,就能在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最年轻的省份纵横驰骋,打得震天响的,恐怕就更少见了。这当然要归功于海南的改革开放,归功于海南的广阔天地。这里一穷二白,大片大片的领域,尚是荒凉的处女地,因而具有全国最大的产出效益。

同时,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伟大的时代。作为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周文彰能在改革开放前,奋斗到专科外语教员的岗位,已属凤毛麟角。假如没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没有“文革”浩劫后智力劳动尊严的恢复,没有从那时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他周文彰纵然有本大的本领,也不过是个“小巷名流”而已。他如何当得上博士?如何能在省级

政府智囊团里出类拔萃？如何能在一个省级经济特区之内，得风气之先，推出一个又一个新观念？饮水思源，当知来之不易。

去年，我们又把周文彰博士派往海外研究处主持工作，最近又任命他为海外处处长。这个处的知识结构要求，是较为扎实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知识。经济学是一门相当成熟的社会科学，门类繁多，学海无涯。哪怕是“观其大概”、“急用先学”，也少不得投入巨大的阅读量。在这个光怪陆离、人欲横流的特区社会，周博士还要在一盏青灯之下，攻读几多少眠之夜？这对于他的学者品格，无疑又是一个考验。

我们的哲学博士，又要在一个难度更大的广阔空间，进行独立思考了。在这艘满载动力的思想战船即将驶出港湾之际，我们诚挚祝愿他再展宏图，“谄”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写成更多更好的著作。

在《绿岛傻想》出版后的岁月内，文彰同志的学者品格果然经受住了考验，果然不负众望，又写出了更多更好的论著。1995年，他的《特区导论》问世，我给该书所作跋文中有如下一些文字：

从为周文彰博士的《绿岛傻想》作序，到为他的新作《特区导论》写跋，时隔两年。《绿岛傻想》是一本文集，而《特区导论》则是他一气呵成的理论专著。

在这两本书出版期间，周文彰博士曾被国家体改委借调一年之久，这在他的履历上又增添了引人注目的一笔。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来到我们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建社会文化处，而在他刚刚被任命为海外研究处处长不久，就被借调进京，并在国家高级领导机关的决策圈子服务。如此北京——海南——北京——海南，从高等学府到省级决策咨询机构，再去国家领导机关，又回省级决策咨询机构，两上两下，四次转换

视角,四次开阔视野,使他对特区的研究既能入乎其内切身体验,又能出乎其外登高俯瞰。如果我们吹毛求疵,还可以说周文彰的经验仍不完全,还应补充从国外看特区和从非特区看特区。不过就我个人的了解,周文彰早就意识到了这两点:其一,他早在去国家体改委之前就主持编写了《国际惯例书库》;其二,他到了北京之后又处处留意全国各地的情况,并且不放过任何调查研究兄弟省市、从“非特区看特区”的机会。至于成效如何,那就要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去判断了。仅仅从我所领导的研究中心这个小天地来看,得到了像周文彰博士这么优越的锻炼条件的人,似乎还没有第二个。

世上的幸运儿有的是,善于发现和捕捉机会的也大有人在,但是真正能够充分利用好机会的人,却为数不多。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周文彰,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他从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消极被动的执行工具,始终在朝气蓬勃地进取和创造。他是一个敢于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人;他是一个善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开拓事业改善境遇的人。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周文彰那样去进取和创造,我们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会极大地增加。市场经济注重的,毕竟是实际行动。

周文彰博士的这本书是专门研究特区理论的。同外国的自由贸易区、保税区之类相比,中国的经济特区所包涵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经济特区实际上不仅承担了对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而且还承担了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试验区作用。而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认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后,经济特区一方面承担起了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探索主要依靠利用外资加速开发建设之路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担起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自由经济区的责任。正因为如此,经济特区的工作才应当比其它地区的工作更加注重理论指导,而且需要一套有很大特殊性

的理论。在用哲学家的思维和方法研究特区理论方面,周文彰博士敢为天下先,写出了第一部论著,这是我们研究中心的幸事。倘若它能进而取得广泛的社会承认,则更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光荣。

据我所知,周文彰博士早在1989年初到海南之时,就怀有探索并建立特区理论的愿望。如今他的不懈努力已逾6个春秋,终于构建起这个理论的框架。在这期间,他从事过政府与社会的各种工作,有过多种多样的体验。对于有心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用的,也没有什么体验是多余的。只要目标始终如一,多一分体验就多一分智慧。在勇于上天入地,并纵横驰骋于陌生的学术领域方面,我本人更应学习文彰同志的胆气和豪情。我想,或许这也是一种英雄气概。

《特区导论》完成以后,文彰同志“马不停蹄”,又投入了新的课题研究。如今时间又过去了两年,作为我们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质量和数量上的“生产大户”,他又取得了一系列佳绩。1995年,他成为我们研究中心中青年学者中获得研究员职称的第一人;1996年,他被评选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同一年,他又被任命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由于我们研究中心非常尊重知识产权的传统,几年来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主任比处长写得多,处长比处员写得多”的新局面。然而无论担任哪一级领导工作,周文彰始终不改书生本色: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下笔如流,滔滔雄辩,才华横溢,文情激越。他的各种论文常见于省内各主要报刊,他的报告讲演遍及全省各级党政军机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他的《特区导论》一书,还成为研究中心第一本被大学用作教材、并正式开课的专著,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海南大学、海南省委党校的兼职教授。至于他在我省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做的广播电视访谈,就更是多得不胜备载,他已经成为90年代海南社会的“公众人物”。我们常说:“个人

的名望是集体的财富”，我们研究中心能够在我省城乡各地享有今天的大影响，同周文彰的个人贡献，实在是分不开的。

今年6月5日，《海南日报》、《海口晚报》等海南各大传媒在头版赫然刊出他在省政府报告大厅主讲“海南经济特区第二次创业”的消息，省委副书记兼省人大主任杜青林同志、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林明玉同志亲临报告会，这不仅在我研究中心成立九年以来是空前盛事，就是在全国政策咨询界同行当中亦属罕见。这表明了省委领导集体对我们的信任，也表明海南社会各界对我们辛勤劳动的承认。

无论是对周文彰博士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我们研究中心来说，迄今为止的一切，才仅仅是一个开始。新版的《绿岛傻想》，也只是记录下了作者进入创作盛年之初的思想足迹。中国的经济特区还在蒸蒸日上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国内外学界的热门课题。我们渴望文彰的新作。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海景湾

修订版自序

《绿岛傻想》初版于1993年，辑录了我自1989年调入海南，到1993年离开海南、借调进京前这段时间关于海南、关于特区的文章。1995年初我返回海南，继续作关于海南、关于特区的研究，不知不觉又积存了大小文章数十篇，足可再出一本小册子。但琢磨再三，觉得还是把它们编入《绿岛傻想》、并以此对《绿岛傻想》进行一次修订为好。

之所以这么考虑，是因为我感到，将我迄今为止关于海南、关于特区的文章合在一起，可为读者提供“一册在手，一目了然”的方便，也可使我的特区思想轨迹较为完整地记录在一本书内。《绿岛傻想》有足够的空间使我可以这么做。

再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借机把《绿岛傻想》初版的编排方式改变一下。在初版《绿岛傻想》中，34篇文章被分为“文化篇”、“观念篇”、“开放篇”、“干部篇”、“开发篇”、“附篇”等6个部分。这样编排的好处是便于读者有选择地阅读，缺点是打乱了文章的时间顺序，容易使我的思想脉搏和研究进程颠来倒去，而且，一些文章被编入某一“篇”多少有点牵强。比如关于“开放意识”的文章，既可编入“开放篇”，又可编入“观念篇”。至于把关于国际惯例的文章编入“开发篇”，更是一种凑合。尽管编排方式对于文章本身的实际价值没有多少影响，读者也不大注意，但我一旦明白过来总感到别扭。

于是,在海南出版社总编辑符策震同志支持下,《绿岛傻想》修订版同读者见面了。在修订版中,初版中的文章被全部保留,同时增加了1995年以来所发表的几十篇文章。全书除少数例外,基本上按文章发表或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在此前提下,适当兼顾“分门别类”。

我从南京调入海南今年已是第九个年头。这九年,正是海南蓬勃发展、急剧变化的九年。当年我刚踏上这座宝岛时,海口市狭小,马路狭窄,楼房破旧,商店自备发电机,道口没有红绿灯,电话号码五位数,打个长途到北京,一个上午不一定能拨得通。现在高楼林立的金贸区、海甸岛、南航路、美舍河等地段,当时不是泥泞的沼泽就是成片的农田。海口到三亚,顺利的时候也要六个半小时(现在高速公路把这一时间缩短为3个多小时)。海口到内地,飞机航班少得买票需要找熟人或出高价(现在随要随有,送票上门)。省政府许多部门花钱租房才算有个办公室,职工宿舍租民房,我一年内就搬过四次家。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而沉入了记忆。海口的变化已足以使一个九年前离开海口、今天再来海口的人到了海口而以为飞机落错了地方。海口的发展变化只是海南发展变化的一个代表,海南的发展变化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海南经济特区思想的正确性。

作为一名特区研究工作者,我对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经济特区战略和建设海南经济特区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情感和体验。九年来,虽然我的履历几经变化——去国外当过访问学者,去北京呆过国家机关;虽然我在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岗位几经调整——先在社会文化处,后调海外研究处,再到研究中心领导岗位,但我关注的中心课题始终是特区开放和海南发展,是特区(包括海南)如何率先实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始终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目的,是为了让海南

对外开放,是为了让海南走出一条特殊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不在开放上做文章,不在“特”字上下功夫,思想停留在常规工作路数上,这不影响海南成为一个省,但却使海南很难称为经济特区。因此,论述特区开放,呼吁扩大开放,努力提供海南如何对外开放的思路,在我的历年的文章中都占有突出位置。

特区对外开放的任务之一,是大规模招商引资,以便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开发建设。这便是特区独特的发展道路,它与那种通过自我积累、自我滚动,依靠自我力量进行开发建设的常规发展道路是很不相同的。而要能大规模地招商引资,特区就一定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投资市场的竞争,将越来越主要是投资软环境的竞争;在未来的投资市场上,谁有好的软环境,谁就拥有投资者。而在软环境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办事效率、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三项。多年来,我坚持不懈地研究软环境,强调软环境,逢会必讲软环境,主张海南应采取“以软取胜”的战略,努力创造一流的投资软环境,增强对海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这一观点构成了我的特区思想的显著特色,以致于一位常在一起开会的朋友私下戏称我为“周环境”。

正当各个特区深化改革,改善环境,探索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新路子之际,有人提出了取消特区政策、让特区不特的主张。这个主张当然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传播不久,我就写文章针对其所依据的理由指出:(1)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它和我国其他地区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因而,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则丝毫不影响特区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客观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我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一部分地区的先行发展和富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并不在于弱化甚至取消特区,而在于强化包括特区在内的发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功能。(3)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恢复的确会削弱特区的某些优势,但

特区不会因此而成为内地,内地不会因此而成为特区;特区仍将保持它的固有意义和价值。

可以说,1995年春天以来,回敬“让特区不特”的种种议论,论证“特区还要继续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成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兴奋点之一。在此之前我听到过这种议论,但正式看到文字材料,是在深圳学者寄来的一份简报上。我立即写出《应当消除对特区认识的几个误解》一文,《深圳特区报》不惜版面,于1995年4月12日全文刊出,《海南特区报》的编辑们更是别出心裁,用《特区的旗帜还要打多久》为题,在1995年4月13日,即海南建省办特区7周年纪念日,在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并加了“重要提示”。这是我的个人署名文章迄今为止所享受到的报纸的最高礼遇。

事隔不久,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同志在1995年8月《深圳特区报》上发表题为《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访谈,针锋相对地批评“让特区不特论”的种种论点,结果引出对方更加激烈的言辞和指名道姓的反击。深圳决定组织系列文章加以系统批驳。《深圳特区报》的同志电话中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说要借用我的一些论述和观点。我十分高兴:维护经济特区的前途和命运是我们的共同任务,我的论述和观点如果可用,那就用吧,这里没有知识产权问题。深圳的文章出来后同时通过传真发给各特区党报,大概是希望各个特区同时刊载。《海南日报》的总编们决定以另一种方式表明该报的态度: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当时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为我的《特区导论》所作的序,标题是我加的:《经济特区要继续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拓道路》。

现在,争论早已划上句号,让“特区不特”的主张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态而失去往日的风彩,但据我所知,认为特区不应该继续享有优惠政策观点仍有一定市场。例如,特区争取优惠政策的努力总有人认为不合时宜。前不久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我见到了“让特区不特”论的始作俑者,他继续认为特区不应该在政策

上“特”，而应该“特”在体制上。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在会上展开了讨论。许多人不懂得，经济特区“特”就“特”在政策，没有政策就没有特区，取消了特区政策也就取消了特区。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这可以说是各国经济特区的共同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种国际惯例。我国采取特殊政策兴办经济特区是考察、借鉴了许多国家经济特区的共同做法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独创和发明。以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则要求取消特区政策的主张并没有什么国际实践的依据。经济特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首先创办的，而且直到今天仍方兴未艾，难道我们这个迫切需要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反倒要提前实践发达国家还没有做到的事吗？退一步说，即使发达国家取消了特区政策，也不能成为我们取消特区政策的理由。我国对建设资金的大量需求，要求我们继续采取特殊政策办好特区以引进更多的外资。我的这一观点，反映在我的多篇文章中。我还利用一切相关的研讨会和演讲机会宣传这一观点。但是，显而易见，指望单纯通过学者的努力使这一观点再度成为社会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仰仗于高层决策者的明智和决断。

在特区政策优势呈日益减弱之势的情况下，特区应该怎么办？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振奋精神，积极开展第二次创业？正确的态度显然应该是后者。特区二次创业最先是由深圳提出的，而从理论上首先给予系统研究和阐述的，可能就是我了。除了收入本书的那些文章外，读者不久将会读到 I 主持撰写的题为《特区二次创业》的专著。我提出，特区二次创业是政策优势频频减弱的热切呼唤，是市场体制普遍建立的能动应对，是经济调控持续进行的积极驱动，是“让特区不特”怪论的反向激励。特区二次创业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新的引力源，以取代逐步减弱的政策引力。这种新的引力源就是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在这里，我进一步发挥了我先前关于软环境的观点，明确提出，特区二次创业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是要摆脱对优惠政策的依赖情结,从“政策吸引”走向“环境吸引”。1996年海南省理论研讨会上,我关于二次创业的上述观点,引起与会领导的极大兴趣,当我的发言已经用完规定的时间时,省领导要求会议主持人破例再给我五分钟,以便我讲完、讲透。

为了帮助人们摆脱对优惠政策的依赖情结,我分析了优惠政策与经济特区的关系。我提出,优惠政策对于特区,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特区创建初期,优惠政策如同特区的生命,没有政策就没有特区。政策优势是特区第一个也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优势,靠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很长时间内并未产生过优势。是政策优势创造了特区的区位优势,特区靠这两个优势起步,又逐渐形成体制优势、人才优势、观念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经济实力优势等,从而形成特区所特有的“特区势”——由于特区的独特优势和历史地位而产生的一种有吸引力的客观态势。政策优势在特区优势中的“份额”已从当初的“唯一”变成了“其中之一”。特区吸引投资的东西,已不仅仅是优惠政策,因此优惠政策的调整并不等于特区前景的暗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定我们的特区信念。我们虽然仍要争取优惠政策,但一定不能依赖优惠政策。我这番话与前一段关于特区“特”就“特”在政策,取消了特区政策就等于取消了特区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前一段话是对社会、对决策圈说的,这番话是讲给特区投资者、特区干部群众听的;前一段话是出于对特区的本质和特点的清醒认识,这番话则迫于对特区政策优势频频减弱的无可奈何。

自特区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怀疑和议论似乎就没有停止过。比较大的争论就有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特区创办之初,争论的问题是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特区开发建设的实际很快说明,特区与旧中国的外国“租界”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次发生在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过去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举措之后,争论的焦点是特区姓“社”还是姓“资”。这场争论直到1992年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之后方告平息。第三次则是1995年前后关于特区要不要继续“特”的大讨论。面对第三场讨论,回顾特区问题的争论历程,我感到,争论之所以一再发生,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特区普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特区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怎么样;而特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软环境方面的问题,也大都与此有关。写一部关于特区的书,以帮助特区内外的人们正确认识特区,正确对待特区,看来是瓜熟蒂落了。于是,1995年上半年,我以对国家发展和特区命运的负责态度,积我多年特区研究之果,写作《特区导论》一书,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特区的地位和作用、特区的特征、特区性质、特区开放、特区投资环境、特区意识、特区规范、特区的历史命运等问题,建构出自成体系的特区理论。这是全国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对经济特区进行理论建构的著作。该书扉页以褐底白字写着:

寄托着期待问世,伴随着疑惑成长;期待实现了再受期待,疑惑消逝了又遭疑惑。这就是中国经济特区。

期待,再期待,特区不断为之振奋;疑惑,又疑惑,特区一再因此迷惘。期待,疑惑,振奋,迷惘,……特区在这双重氛围的融汇交替中走完了过去的岁月,特区难道还要在这双重氛围的融汇交替中迈向未来的世纪?

我并不奢望这本书就能结束“期待、疑惑、振奋、迷惘”的双重交替,但我确实希望从此不再有这种交替,让特区、让全国在不争论中稳步发展前进。

五个经济特区,还有浦东经济开发区,总的功能定位是共同的,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在这个总的功能定位下,各个特区又有其特殊的定位:深圳特区立足于深港对接,珠海特区定位于澳门回归,厦门特区利在两岸合

作,汕头特区旨在吸引侨资,浦东开发区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海南特区在我国发展全局上居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作用,一直缺乏明确、统一的认识。结果,国家缺少一种对海南一以贯之的发展方针和政策体系,海南缺少一种矢志不渝的主攻目标及相应措施。1996年我和李克、廖逊、张国平三位专家对此进行过探讨,在此基础上,我形成了对海南特区功能定位的系统认识,提出海南三位一体的对外开放战略。我的观点是:(1)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它可以获得各种功能定位,但在我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伟大进程中,赶超台湾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成为它的基本定位。(2)海南赶超台湾的功能定位需要一些相关条件的支撑;把海南作为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基地,可为海南实现赶超注入强劲的经济活力。(3)海南赶超台湾、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地区)水平的历史任务,使它既不同于内地,又不同于其他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海南、放活海南,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全局性需要。文章在《海南日报》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一些记者又热情地写成内参送高层领导参阅。

实际上,我认为不仅应该放活海南,而且应该放活所有经济特区。放活特区的思路是:第一,坚持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逐步让特区实行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特殊政策。第二,不要让特区比照内地,特区的参照座标应当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目标是超常规地缩小其与世界发达水平的差距,而不应让特区的发展步伐受制于中西部的黄土地和戈壁滩。第三,要舍得减免关税。办特区的经济价值就是在若干地方,以减免关税和其他优惠政策为引力,吸引外资为我们搞建设,在内地“造香港”。第四,充分放权,让特区自主决策,自主审批,尽量减少特区需要向国家有关部委申报批准的事项。总之,特区只能越办越“特”,越办越合乎世界经济特区的惯例,而不能相反。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主要集中于《应当消除对特区认识的几个误解》、

《正确对待经济特区和地区差距》、《经济特区政策只能强化不能削弱》等文。

自1995年从北京返回海南至今,我感到这一时期是我特区研究历程中最顺畅的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多年的思考积累到了涌流的时候,一方面是由于特区实践的客观需要的推动,还有则是《海南日报》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激励。分管理论评论工作的副总编辑常辅棠把一版的“特区时评”和“天涯纵横”两个栏目的许多位置给了我,我有稿,他就发;他肯发,我必写;形成了一种让人不忍辍笔的循环。理论部主任张松林和编辑吴泽明有意想让理论版发点有特色的大文章,张松林本人就是一个出选题、抓选题的好手,有的文章就是他命题我作文的。理论版慷慨地一次又一次用满版的篇幅刊用我的文章,无疑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坚定我们的特区信念》一文见报后,总编辑林凤生同志表现出特有的兴奋与热情,专门款待我和理论部的同志们,讨论如何把理论版办得更好。当然,依我的感觉,如果《海南日报》再少一点不必要的顾虑和忌讳,我们写文章的积极性还会更高些。

写文章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写文章的过程有时是痛苦的,但文章见诸报端时一般则是愉快的,特别是当文章引起一定社会反响时更是如此。于是,结果常常能消解过程的痛苦,使你写完一篇还想再写。然而,我们单位作为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是十分充裕的。“坐班制”的管理、参加各种会议、接待来访等,使我白天几乎写不了东西。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后更是如此。写作只有靠夜晚和节假日了,而晚上下班回家差不多已很疲乏了。所以,写文章实际上是在拼毅力。同时,我的研究工作也不可能都表现为写文章。这几年,我参与策划发起和操办过海南国际椰子节,主持编写《海南省情概要》和大型丛书《国际惯例书库》,撰写《特区导论》,帮助海口制药厂摆脱“三九胃泰”纠纷所造成的困境而走上蓬勃发展之路,主持或参与一些企业和开发